

● 彭林 著

《周礼》主体思想  
与成书年代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

張岱年題



● 彭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陈宝良

责任校对：史怀

封面设计：谭国民

版式设计：石钟

《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

ZHOULI ZHUTI SIXIANG YU CHENGSHU NIANDAI YANJIU

彭林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遵化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 印张 2插页 210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004-1006-9/K·137 定价：5.00元

## 序

赵光贤

《周礼》一书原名《周官》，最初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传云：献王好古学，广求遗书，所得皆先秦古文旧书，有《周官》、《尚书》等多种。武帝时“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献王入朝，当以此书进献，遂入于秘府。哀帝时，刘歆校书中秘，得此书，著于《七略》，班固本之，作《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汉末郑玄作注，唐贾公彦作疏，此书遂列于五经，为三礼之首。自汉至今，学者对此书争论甚烈，迄无定论。

我们在今日跳出经学之争的圈子，以史学眼光看此书，把它作为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史料，应取何种态度，学者所见亦往往不同。我认为要深入钻研周代典章制度，对此书必须作一彻底的探讨。有几个问题必须求得可信的结论：一、此书的著作年代；二、此书的主导思想；三、此书的性质及如何看待先秦著作；四、此书与真《周书》及金文对比研究，观其异同；五、如何正确使用此书。我认为在这些问题未解决之前便冒然根据此书讲周代典章制度是靠不住的。

本书是彭林同志的博士论文，在这篇论文里，他对上面的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关于《周礼》著作的年代问题，他认为此书当作于汉初，可能在高祖至文景之际。我以为这个说法比之战国说更为妥当，因为战国是百家争鸣时期，当时如有这样有组织、有条理，讲周代官制的书，设官分职，细密如此，一定会震惊一世，争相引用。事实乃正相反，先秦诸子不仅无人

引用，甚至无人提及此书，岂非怪事。可见战国时期，并无此书。又此书规模宏伟，乃统一大国的理想蓝图，九服之设为先秦人所不能想象。合理的推测，此书以统一帝国为范本，而又鉴于秦皇专任刑法之弊，终自速其亡，于是在书中强调教化，以儒家德治之说，以济专任法治之穷，盖有深意存焉。

关于此书主导思想，学者或以为法家之言，如大宰之职，以“六典”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如此之类，职掌分明，可称法治之典范。或以为其精神属于儒家，书中强调教化之重要，集中于地官。大司徒之职，施十有二教：如“以祀礼教敬”，“以阳礼教让”，“以阴礼教亲”，“以乐礼教和”等，皆儒家德治主义之具体化，其它散见者尚多。总之，作者之意兼取法儒之长而统一之，至为明显。凡此均指此书之内容，可一望而知。至于贯穿全书的结构，则隐含其中而为学者所忽略者乃阴阳五行思想，作者列举全书例证甚多，绝非出自臆想，可谓阐幽发微，言人所未言。按阴阳五行之说起于战国之季世，至汉初又杂入道家之言，遂成黄老之学，盛于文景之世。此书以阴阳五行思想作为全书的骨干，以儒法思想为面貌，正好为此书作于汉初添一佐证。

彭生自学成材，曾在江西南昌航空工业学院附中教文史课，于古文字学有极大兴趣，苦于无书，乃借阅江西省立图书馆多种甲骨文、金文著作，手自抄录全书而学习不辍。1984年以同等学力报考我校商周史硕士生，一举夺魁，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转为博士生。问学于余，余问有无决心专攻《周礼》，并告以欲彻底研究周史，不论古文献或金文，必须一书、一篇认真攻克，如在战场对待敌人，若无勇气与决心，则必无成。彭生以为然。但手头无书，1987年秋南游，于绍兴旧书肆中得孙诒让《周礼正义》，狂喜，急购归，从此寝馈其中，兼参考它书，二年而论文写成，答辩时得专家称许，谓有创获。余谓彭生，过去学者只知通训诂，或专攻

禄田、沟洫之类，陷于牛角尖中，此大不可，应高瞻远瞩，举全书无巨细，一一探其本末，求其真义，使无遗义，则不仅于整理古籍有功，于研究周代史事亦必大有贡献，希望你继续搞下去，完成这个艰巨而有价值的工作。他深以为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以此书印行，可谓功德无量，彭生请序于余，因拉杂书之，是为序。

1990年12月书于北京  
师范大学之亡尤室

## 序 言

杨向奎

《周礼》在我国经书中是一部大经，包含的问题多，对后世的影响大，而且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焦点，论者或认为是周初经世大典，或以为歆、莽伪造，差距很大。历代研究《周礼》的书汗牛充栋，清代人的研究成果尤多。研究《周礼》的人，必须熟习过去研究者的著作及其内容观点，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就是几百万字的大书，通读它就要年月。《周礼》有丰富的内容，比如其中各种制度，对这些制度的研究，需要谨慎，不能遗漏，不能前后矛盾。因为《周礼》中涉及到古史的问题很多，和先秦诸子及各种古籍进行比较研究是不可少的工作，当然这要增加许多难度，既然决心要作《周礼》研究，就应当是知难而进，功夫到了就会有所收获。彭林同志从读硕士生时就在赵光贤先生指导下，开始对《周礼》进行学习并积累相关的材料，读博士研究生后更进一步的研究，写出了《〈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的论文，经答辩通过以后，他又根据专家、学者的意见做了修改，并获得出版的机会。从这本书稿中看得出彭林同志在作《周礼》研究时未为旧说所囿，能独抒己见而有所创新，通过对“六官”体系的论述，把握《周礼》的主体思想，揭示其时代特征，在研究结果上有所突破。

《周礼》是儒家《礼经》中《三礼》之一，一名《周官》，相传为周公“所建官政之法”，而《仪礼》相传《经》出自周公，《记》则出于孔子及后学。《礼记》内容庞杂，体系不一，盖出自

孔门各派之手，用以发挥孔门学说及礼之蕴藉者。《三礼》内容丰富，而问题实多，是两千年来经学史上争论未决的问题，也是经师潜心研究的中心问题，盖“礼”为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寄托所在，无“礼”是为“无德”或“无理”。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以六经传六艺”，遂构成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礼乐文明的核心，而儒家乃以学术宗派代替了宗教职能。《诗》、《书》、《礼》、《乐》对于孔子来说都是“故”，“故”就是“古”。春秋时代，“中国”代表了天下，是最先进的地区。学术的渊源，除实践以外，来自古昔的虞夏商周，孔子求学之道是“温故而知新”，损益传统文明而发扬光大，这“故”或“古”主要是宗周时代的礼乐文明。而这种文明实为儒家思想中之典型的“一统制度”。“一统”必有归宿，统一于夏，或统一于夷？要统一于夏，诸夏即中国，中国即华夏，在“大一统”思想体系中，遂冲破夷夏界限，而夷可以变夏，夏可以变夷。统一于夏，即统一于夏的礼乐文明，这种文明即以周礼为指归，孔子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宗周礼乐文明虽不限于《周礼》及《仪礼》，但《仪礼》实多宗周之礼制条文，而《周礼》一书乃根据先秦礼制而加以扩张，亦即根据一统规模之理想而制造，它不完全是实录，是根据实录而理想化的著作。

《周礼》的著者在经济基础上虽然维持着井田公社制，上层自然是诸侯领主制。这是他根据西周以来的井田制加上宗周至春秋时代的诸侯领主制；这种制度不可能有真正的一统，因为诸侯经济独立，政治独立，周王地位与诸侯等耳，不可能有真正的大一统。但《周礼》著者的思想却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我们以为《周礼》出于儒家的左翼，即接近于法家的一派，这派儒家多在齐国，《公羊》出于齐，荀子的思想近于法家也近于《公羊》，因此我们说“周礼在齐”。“周礼在鲁”是儒家的正统派，以孟子为代表；“周礼在齐”是新兴的儒家，有法家色彩，以荀子为代表，《公



羊》为齐学，《周礼》亦为齐学。《周礼》提倡一统，而《公羊》主张“大一统”。“一统”需要一强有力的中央，中央君主掌握赏罚的大权，是谓“二柄”，或“六柄”、“八柄”。在《周礼·秋官·司寇》中表现出一个严刑峻法的国家。这在古代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春秋末年诸侯国开始公布刑法，第一次是公元前535年郑国子产铸刑书，第二次是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铸刑鼎，都曾引起当时名人的反对，而《周礼》却公开刑法，用以巩固一统国家的社会秩序。但是在“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中却不是如此，《公羊》虽属齐学，然不尚兵刑而尚文教，可以说《公羊》思想集齐鲁两派之大成，立“大一统”是齐学一统学说之发展，而尚文教是鲁学传统的礼乐文明。

宗周相传的礼乐文明在今传《仪礼》中还保留着许多。古代礼仪多源于民族间流行的风俗习惯，经过加工改造，以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比如由原始社会礼仪之交易性质变作宗周之货物交易，带有浓厚的礼仪色彩，我们在“礼尚往来”中还可以找出它的来源。宗周初年，对于礼乐的改造工作可能是长期的集体的工作，而后人多推之于周公，因此谓《周礼》、《仪礼》出自周公。个人著述事业，就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材料说，春秋以前还不存在，虽然史官秉笔可以记录，但不能说是著作，若《三》之有体系的大著作，在宗周时代还没有这种体裁，也没有人有这种才能，为文而作系统著作，战国时才开始大盛，《周礼》、《仪礼》只能根据宗周的礼乐制度而系统化及理想化。《周礼》有理想化的部分，因为在宗周我们看不出有整齐的六官制度及五等爵封制，但《仪礼》中许多条文，我们可以得到实证，而不是后人的理想。

《周礼》中有五行学说，而齐国是五行学说的中心地带。我们研究《周礼》的宗教崇拜时会涉及书中的五行思想，在其它方面也有明显的五行说。彭林同志在这部书中，对《周礼》的五行说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有创见，有发挥，是应当肯定的。先秦时

代距现代遥远，人们对它的感情日见稀薄，但不能“数典忘祖”。彭林同志能对《周礼》潜心研究，辛勤努力，写出这本优秀著作，实在是好事，因之这部书是值得一读的。

1990年12月于北京

## 自序

1984年秋，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忝列于赵光贤教授的门墙之下。两年后，我转为博士生。一日，在先生的书房亡尤室侍坐，谈及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先生对我说，在中国学术史上，《周礼》是一部影响很大、但又颇有争议的著作，其成书年代问题，论辩二千余年，至今犹不能决。因此，学者们多是凭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在不同的程度上使用此书，或以为是西周信史，或以为是战国之制，或以为是新莽伪作，莫衷一是。考古界有些学者则往往以《周礼》说三代文物，甚至说石器时代的文物，这就直接影响到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为此，需要对《周礼》一书本身作彻底的清理和反思。封建社会的学者，研究《周礼》的成果极富，由于时代的局限，今已显得陈旧。近代著名史学家钱穆、顾颉刚、杨向奎先生等都曾系统研究过《周礼》，但是，学术界迄今未取得一致意见。近些年，港台的《周礼》研究比较活跃，大陆学者则相对地显得沉闷，青年学者多视之为畏途，这是很可忧虑的现象。因此，先生希望我系统地研究一下《周礼》，在充分吸收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先生治学严谨，文风笃实，远宗崔东壁，近师陈援庵，在史料的运用上，尤为注重其时代性。主张在做研究工作之前，首先要认真地研究史料，摸准它的时代，根据其可信的程度，区分为不同的等次，然后恰当地加以使用。对《周礼》这样一部复杂的书，先生早就有意作全盘研究，现在先生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我，

表达了先生对我的厚望，我无可推托，内心却不免感到惶恐。《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是著名的学术悬案，以我的浅陋，去做这样的难题，深感力不从心。《周礼》一书涉及的问题多而复杂，汉以来的研究之作堪称卷帙浩繁，阅读量很大。为了作时代特色的比较，还必须通读先秦诸子，这些工作必须在三年读书期限之内做完。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重压。但是，师命难违，有困难只能靠自己的加倍努力来克服。于是，我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一选题。1987年，我随先生到浙江省新昌县参加长江下游古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的考古界师友听说我正在做《周礼》研究，十分高兴，认为这一选题虽然是历史学领域的，但对于考古学同样有重要意义，因此，给我以热情的鼓励和殷切的期待，这就使我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

考据是《周礼》研究中的传统方法。《周礼》有三百六十余个职官，论者仅取其一小部分，与文献、金文相比较，论证其时代特征，进而推定其成书年代，是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逻辑思维方式。但是，《周礼》所用的职官材料，情况很复杂，年代跨度很大，并不单纯，因此，大家都窥见了“一斑”，结论却并不都是一样的“豹”，令人有“盲人摸象”之感，彼此又各执一端，见仁见智，各不相让。《周礼》成书年代问题久讼不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作全面的、综合的研究。有鉴于此，我最初设想对全书的职官逐一考证。但是，先秦文献阙如，金文材料又过于简略，缺环也太多，《周礼》中的大多数职官无从质证，行之不久即中辍，不得不另辟蹊径，在方法论上谋求变革。

比较了各家的研究方法之后，我认识到，只有从研究全书的思想体系入手，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它的时代特色。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思想和风尚，每个时代都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烙下印记。举例来说，如果把本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的报纸放在一起，其各自的时代特色，一目了然。《周礼》作为一部理想国的鸿纲大典，不可能没有内在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不留下时代的印记。但是，《周礼》一书是以介绍官制的面貌出现的，并无专门的篇幅论述作者的经略思想，因此，研究者多从具体行文中去归纳和推绎。我认为，《周礼》卷首大宰的“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条官法，是作者治国思想的总纲，其余各官的官法则是其细目，以此为脉络，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住全书的思想体系，并找出其时代特征，推定其成书年代。于是，本文就写成了现在的样子。这样一来，我似乎从“考据”走入“义理”一路了。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和义理曾经是水火不容的两大派。考据家注重例证和归纳，义理家讲求经义和名理，两者各有所长，但却互相歧视，考据家鄙视义理家的疏阔，义理家则嘲笑考据家的琐屑，从而形成了深刻的门户之见，限制了各自的视野，两者各有所蔽。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应再为这种偏见所囿，而应兼采两家之长，相补互济。本书力图使考证与义理相结合，以考证为义理的基础，以义理为考证的指归，但是限于自己的学力，这一点不一定能做好。

本书的结论是，《周礼》的主体思想是由儒、法、阴阳五行等三家复合而成，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成书年代在汉初高祖至文帝之际。对此，我不敢以为必，不过聊备一说而已。关于《周礼》成书年代的各种说法，是在两千多年的论辩中形成的，各自都有各自的依据，问题的真正解决，还需要时间。本书若能对《周礼》研究有所推动，就足以自慰了。

作者

1991年2月于北京

# 目 录

序 赵光贤	1
序言 杨向奎	4
自序	8
第一章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的方法问题	1
第一节 《周礼》源流	1
第二节 《周礼》成书年代的纠葛	4
第三节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的反思	8
第四节 本书之研究视角	19
第二章 《周礼》的阴阳五行思想	24
第一节 《周礼》阴阳对立的宇宙观	25
第二节 《周礼》六官兼包阴阳五行	31
第三节 《周礼》六官与五行辅天	37
第四节 关于五帝和五帝祀	40
第五节 《周礼》五行说十证	44
第三章 《周礼》的治民思想	64
第一节 重教化	66
第二节 隆礼义	82

第三节	慎刑罚 .....	91
第四章	《周礼》的治官思想 .....	101
第一节	定分 .....	104
第二节	观法与授法 .....	108
第三节	联事与制衡 .....	114
第四节	官成、官计与考课 .....	118
第五节	刑赏 .....	124
第五章	《周礼》的理财思想 .....	130
第一节	对人口和劳动力的管理 .....	131
第二节	富国思想 .....	142
第三节	财政管理机制 .....	152
第四节	重农本 .....	157
第五节	抑工商 .....	160
第六章	《周礼》所设计的国家政权模式 .....	173
第一节	王的地位与权力 .....	174
第二节	冢宰之制 .....	185
第三节	三公与六卿之制 .....	195
第四节	畿服所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	211
第五节	《周礼》是理想国的典制 .....	224
第七章	《周礼》成书于汉初 .....	229
第一节	《周礼》主体思想的基本特征 .....	229
第二节	“《周礼》不成于一人一时”之说不可信 .....	231
第三节	《周礼》不可能成书于西周、春秋 .....	234
第四节	《周礼》是否成书于战国 .....	238
第五节	《周礼》成书于汉初 .....	247
后记	.....	257

## 第一章 《周礼》成书年代研究的方法问题

《周礼》是十三经中的一部大经，也是问题和难点最多的古籍之一，其成书年代问题更是学术界聚讼千年、迄今未了的著名悬案。

在经学史上，《周礼》是经今古文之争的焦点之一。而王莽篡汉、宇文周革典、王安石变法都将《周礼》奉为圭臬，因此，关于《周礼》的争论，又往往带有学派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复杂色彩。撇开这些非学术的因素来看，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周代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法制、宗教等方面状况如何估价的问题。所以，结束这桩公案，不仅是历史的要求，而且对于深化先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第一节 《周礼》源流

《周礼》一书，始出于西汉景帝、武帝之际。《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类有“《周官经》六篇”，班固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荀悦《汉记》云：“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王莽时，刘歆为国师，



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可见，此书西汉旧题为《周官》，刘歆奏《七略》时犹沿用此称。王莽时，更其名为《周礼》，并列于礼经，其时在“平帝元始五年，至王莽居摄三年之间”<sup>①</sup>。

《周礼》的发现经过，不见于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汉书》的《儒林传》和《艺文志》等文，唯《汉书·景十三王传》云：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献王立于景帝前二年，薨于武帝元光五年，则此书当出于景、武年间，但是，《史记·五宗世家》中却没有上述文字，是班固杜撰，还是太史公疏忽？学者见仁见智，诸说歧异。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认为是献王得之于李氏。《隋书·经籍志》说同。马融《周官传》说是得自山岩屋壁：

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sup>②</sup>，既出于山岩屋壁，复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

---

① 见洪业：《礼记引得序》（见《洪业论学集》206页）。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以为《周礼》之名始于贾公彦，误。详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一。

② 按：挟书之律，除于惠帝四年，而非孝武时，马说误。